

时代主题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理论是列宁首先提出的，反映了阶级斗争学说从一国走向世界的延伸以及战争与革命问题在全世界的泛化。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学说，以中国革命经验为基础并结合时代变迁，先后提出“两类矛盾”、“三种力量”、“两种力量”、“两种运动”、“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理论”等，但是毛泽东的时代观囿于其本人与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关系，以及敌友观念的局限，还有其时代的鲜明印记。

将时代主题上升为世界主题，突破“战争与革命”这个传统思维框框的是邓小平。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局势的逐步缓和，发展中国家在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上提出了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作出了世界大战在若干年内打不起来，中国可以争取加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论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至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在充分的观察与分析基础上形成了明确的世界主题思想。1985年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访华团时精辟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作为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关键与主要对策，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样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一定的时代观念总是一定时代主要矛盾的表征。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是两大阵营激烈对抗，争夺世界霸权，疯狂进行军备竞赛的时代，是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基本上承继并发展了列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进入七十年代后，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第三世界作为世界性力量迅速崛起并积极探索适应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

安全与发展 冷战后世界的新主题

复旦大学 王义桅 江洋

这个过程中，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受到了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严重束缚。同时，环境污染、自然资源、人口与粮食等全球性问题成为影响并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依靠持续的发展才能得以解决，但发展却受到和平的严重制约。美苏对抗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成为对世界发展的最严重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作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之主题”的判断。

安全与发展演化为时代主题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和世界格局转换时期，世界局势更加动荡不安。邓小平同志清醒地告诉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如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但是，随着冷战的余波逐渐平息，全球多极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朗，世界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现在制约整个世界发展的根本因素不仅仅是两极对抗造成的和平问题，也不仅仅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问题，而更具有了以动态性与模糊性为特征的安全问题。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性主题的涵义更加具有了过程性而非终结性。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也从世界大战转向地区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与种族冲突以及因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等。这样，经济动荡、环境污染、核扩散、跨国犯罪、人口与资源等问题成为地区稳定与世界秩序的主要潜在威胁。和平问题逐渐演变为安全问题。建立新的安全机制，倡导新的安全观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与时代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发展的涵义也从过去的南北差距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深入至关系全人类命运的可持续发展范畴并具有了整体性和长远性。正如1995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的：“发展不仅是人文的和持久的，而且应当是安全的、可持续的。”为安全而不断寻求发展，为发展而不断营造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安全的发展与发展的安全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安全与发展

也就相应成为冷战后世界的新主题。

和平与安全问题既密切相关又各有侧重。和平基本上相对战争而言，指没有战争状态的现状，因而是一种静态、表层性概念，涵义较窄，而安全则是一种动态的、涵义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应然状态的维持与稳定层面，也包括事物（务）自身生命力、意志呈现与拓展层次，所以从本质上说，安全是内在的和自为的。

安全问题体现于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环境等，并表现于各个层次。既有部门、地区、国家安全，也有国际、全球安全，总体上构成人类安全的各个范畴。但从国家角度讲，安全具有三种层面的内涵，并依次指示出国家发展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不同态势。

首先是状态稳定与延续层次。主要体现为既得利益的维护层面，包括国家要素（领土、人口、政府、主权）保全，政治、社会稳定，制度延续，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维系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社会与国际环境的稳定与可靠等。这是国家安全演绎的初级形态，多数发展中国家安全处于该层次。

其次是力量发展与均衡层次。包括一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各领域及其内部的和谐进步，国家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以及国家实力增长与利益获取的顺畅和有效等。而有碍于此则会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从本质上说，只有实现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与国际秩序的合理、民主化发展，才能持久维护国家安全。

第三是意志倡导与表达层次。这主要指对国内、国际行为规范的理念倡导、国家意志的表露与国际权利的分享等。国际舞台上发展中国家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或民族（国家）主义、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都是其在安全领域的意志倡导与表达的体现。而不同的安全观念则是导致冲突与合作的根深蒂固的源泉。

由此可以看出，安全概念具有自身的演绎层次，安全涵义的变迁与深化正折射

出时代矛盾转移的事实。

纵观战后世界发展历程，本世纪中叶，核武器的出现及后期导致的美苏核对抗，将人类社会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而发生在世界各地的诸多恶劣的环境破坏事件，如臭氧层耗损、全球气候变暖等，显示出地球环境对人类安全所构成的巨大挑战。所以生存与发展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国与国之间，而是上至全球社会，下到地球上的每一位居民，并最终归结为人的安全问题。正如美国学者罗纳德·斯蒂尔所指出的：“对公民幸福的最大威胁越来越多地不是来自别的国家，而是来自以下这些情况：资源缺乏、人口增长、失去控制的城市化、大批的移民、环境退化、个人和团体的恐怖活动以及经济剥削。”

冷战的结束使和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至全球一体化问题。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肆虐，推动了人们对既有国际汇率机制、“东亚模式”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再思考。九十年代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影响更在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国家的内部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可能严重破坏邻国，乃至整个地区的稳定”。这同时也表明一国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是密不可分的，世界处于严重相互依赖的时代。

海湾战争作为世界格局转移的产物，曾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而部分由于波黑内战刺激下的北约东扩更是实行地区安全一体化的突出表现。近年来，更广泛的安全体制化建设越来越占据国际社会的主要议程。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及印巴核试验的公然挑战所导致的国际热点……种种迹象表明，安全问题已成为制约各国、国际社会乃至人类发展的终极性主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从根本上是在建筑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安全新秩序。

所以，和平问题一方面由于冲突的局部化、国内化而更多限于国内，失去了往日东西问题的总体性与根本性，难以涵盖

更广泛的全球与人类生存与发展范畴，另一方面更由于难以渗透至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中去，因而和平作为世界主题涵义，本身越来越具有安全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后世界的主题应是安全与发展，这是时代矛盾转变的必然产物。

安全概念的辨析

事实上，安全与发展相辅相成，安全侧重发展的状态与保证，发展则是安全的目标与动力。安全与发展时常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使世界主题更趋一致。

必须指出的是，和平问题向安全问题的过渡并非以冷战为界，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尤其在七十年代后期初见端倪，冷战后则十分明显。认为安全与发展是冷战后世界的新主题并非否定已有的认识与判断，而是对和平与发展之世界主题认识的深化和理解上的侧重。

总之，安全概念是突破了冷战思维的一种新的观念，包括：1. 安全问题不仅指国家安全，而且包括人的安全乃至全人类的安全；2. 它不仅指军事安全，更多指环境、经济安全，它是一种综合安全；3. 它不仅是一个个孤立国家、相互排斥的安全，而是一种全球共同的合作安全。比如如何共同迎接艾滋病、环境问题甚至最近的计算机千年问题（即技术安全）等，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的共同挑战。

当今人类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对世界财富的攫取与争夺主要不是靠军事力量等“硬权力”，而是建立在以知识为武器的“软权力”基础上。东西问题因两极对抗的消失而失去其原有内涵；南北问题也赋予了更新的发展涵义。作为指导我们外交实践，与深化对国际政治本质认识的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东西南北”思维框框，建立新的安全观，为世界的安全与发展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责任编辑 沈佩萍